

#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李重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关键词:**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义和团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3-0130-08

100多年来,政治家甚至历史学家不断重塑<sup>①</sup>“作为事件的义和团”<sup>②</sup>。由于“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sup>③</sup>,我以为重塑“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依然任重道远。“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sup>④</sup>,这是当时就有的民谣。而1982年6月,在四川大足县<sup>⑤</sup>召开的一个小型反洋教运动史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余栋臣起义实为义和团运动序幕的看法,可惜未看到原文,只见诸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的一小段文字<sup>⑥</sup>。这便使我仍有机会论证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收稿日期:2011-03-29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封闭状态下的激烈冲突”(2008076)

作者简介:李重华(1962-),男,甘肃泾川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

①从宏观角度而言,如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黄祸论”,在国内,20世纪20年代以前普遍否定之,但到了20年代就开始美化,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在微观方面,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朱红灯起义作为开始标志,后又改为赵三多起义。

②美国学者柯文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义和团运动实际很复杂,有“作为事件的义和团——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有“作为经历的义和团——人们经历的过去”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被神话化的过去”之别。

③芮玛丽语,转引自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序言第2页。

④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57页。

⑤本文所谓四川皆指四川、重庆分治以前之四川,重庆直辖后大足县就归重庆管辖。

⑥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等《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11页。那次会议未出论文集,吴文也未谈到提出该观点的学者姓名。

### 一、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

有人可能质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是教案,而义和团运动不是教案,是革命高潮,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如何能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笔者的看法是,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

教案与义和团运动都反对以洋教为代表的西方势力。长期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贝指出:“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激烈的反洋教运动主要是一种排外行为,换言之,传教士受到攻击只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并非因为他们是传教士。”<sup>[1]171-172</sup> 美国学者柯文认为,19世纪,商人到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与军人到中国谋求特权与让步,唯有传教士到中国不是为获得利益,而是给予利益,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在当时所有到中国冒险的外国人中恰恰是传教士引起最大的恐惧与仇恨呢? 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传教士始终坚信,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文化,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sup>[2]528</sup>。这就已经带有一定的侵略倾向。更何况传教“工作是一些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保护和炮艇的支持下进行的”<sup>[3]188</sup>。所以,毛泽东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sup>[4]1506</sup>可见,“精神侵略”也是侵略,反洋教就是反侵略。

不可否认,义和团直接参加了对侵略军的作战。但是,据林华国分析,至少在京津一带,抗击侵略的主力毕竟还是官军,义和团只起配合作用<sup>[5]152-192</sup>。美国学者费正清把教案的行为模式分为士绅鼓动、谣传、群众怀疑、威胁和有组织的群众暴动<sup>[6]481</sup>,而这些行为模式在义和团运动中可谓应有尽有,只是更加走向极端——北京前门外一次大火所造成的损失就在1 000 000英镑以上<sup>[7]239-240</sup>,“共计被杀害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友18 000人;更正教教士188人,教友5 000人”<sup>[8]193</sup>,甚至外国人的尸体也被从坟墓中拖出烧掉<sup>[7]238-239</sup>。至于贺弘景把拆铁路、砍电杆和焚洋货诸行动也作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的区别<sup>[9](pp268-269)</sup>,实过于勉强<sup>⑦</sup>。

列强以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而襄赞李鸿章多年的周馥不无痛惜地指出:“自中外通市以来,肇衅之端半由教案而起”<sup>⑧</sup>。费正清也指出,晚

清数百起教案,“其中至少有50起需要最高级外交当局来解决”<sup>[3]188</sup>。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就是“在那个被杀的传教士的鲜血上找到了一个开战理由”<sup>[10]521</sup>,巨野教案“引发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系列事件”<sup>[11]118</sup>。

“多数教案的每一细节都符合其原型——开始是书文揭帖发动民众,然后是清朝官员装聋作哑(接到援助请求时,他们总是很晚才到场),最后是询问多少颗人头、多少金钱才能满足赔偿要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道<sup>[12]301</sup>。如果说丁氏难免带有偏见,那么,再看立德夫人的观察:“任何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国人自己作的调查与处理,其结果无非是处决几个老百姓,谴责在华的外国人行为,如果外国人已经被杀,不能站出来说明真相的话,那么这些外国人的朋友就会受到指控,地方官员通常也会迁任——一般说来是升官。”<sup>[13]211</sup> 朝廷也一样,“抱人心风俗之忧,而存补偏救弊之念者,惟有平日联络绅民,阳为抚循,阴为化导,或启其误,或破其奸,是亦不禁之禁”<sup>⑨</sup>,可谓对整个传教问题数十年不变的基本国策,到后来“义和团仇杀洋人的举动,便成为国家明令允许的政策”<sup>[8]196</sup>,实属必然。

所以,吴盛德、陈增辉《教案史料编目》就包含“庚子教案”<sup>[14]104-111</sup>,柯文把义和团运动与教案一起列为晚清“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动”。现在,廖一中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起大教案”<sup>[15]9</sup>,杨天宏持相同观点<sup>[16]29</sup>。

### 二、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

有人可能更讥笑我缺乏常识,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既无义和团组织,又无降神附体仪式,如何能成为义和团运动序幕? 其实,“片面的和个别细节的研究,只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不会给人们带来启示,还可能把更重要的问题掩盖起来”<sup>[17]96</sup>。

1898年10月25日,赵三多起义时仍使用乾嘉时期就出现的义和拳称号,由义和拳到义和团的转变当在1899年10月朱红灯起义时,作为乡团的义和团在咸同年间就已经存在。义和团进京后方称坛,“这个名称在山东农村中却从未使用过”<sup>[11]230</sup>,团的概念同样出现于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赵三多起义更没有降神附体仪式,“他们习拳几乎不存在任

⑦实际上即如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也有“蠢起砍毁沪渝电线”行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六辑(一)目录第68页(文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版。

⑧周馥为李刚己《教务纪略》所作叙,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⑨同治年间,教务问题特别是教案愈形严重,恭亲王奕訢等总署大臣遂提出这样的策略,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七册第269页。

何宗教内容”<sup>[11]162</sup>。如果组织与仪式是一道分水岭,则赵三多起义恐怕也不能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开始。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不是由义和团组织与降神附体仪式决定的,而取决于在这个组织与仪式下究竟做了什么——“扶清灭洋”,像火山爆发一样反侵略。赵三多起义之受到重视,无疑是因为此乃“‘义和拳作为反洋教活跃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及其主要口号‘扶清灭洋’出现的开始”<sup>[11]162</sup>。我们之所以不能说义和团运动在乾嘉抑或咸同时期即已开始,就在于“名相如,实不相如”<sup>⑩</sup>。日本学者小林一美指出,“很多中国学者义和团源流论的最大弱点是热衷于寻亲,而忽略了对形成义和团运动的固有逻辑及其发展规律的解释”<sup>⑪</sup>,一语中的。

正如辛亥革命并不等于辛亥年的革命一样,义和团运动也不等于义和团的运动。义和团组织与降神附体仪式只是义和团的一些特征,而义和团运动简直“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是一场民族革命战争”<sup>[18]82</sup>。清廷一度承认义和团为义民,命大臣统之,“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sup>[19]14</sup>,能因此说慈禧太后便是义和团的总首领?光绪皇帝反对开战,岂真是义和团所指斥的“教主”<sup>[19]12</sup>?东南互保“始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幸免瓜分之祸”<sup>[20]175</sup>,正反映出义和团运动中的中国人不全失去理智。

“山东说”、“北方说”无疑太看重组织与仪式,把义和团运动狭隘化,把义和团运动的负面形象放大。

### 三、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

作为“义和团变乱前夕四川省的一个反教运动”<sup>[21]112</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爆发时间、背景、行为方式、斗争策略或目标以及清政府态度诸方面相同或相近,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1890年,余栋臣第一次起义。1898年4月下旬,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翌年1月失败。从爆发时间看,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仅比赵三多起义早半年,按陈振江、程歆的说法仅早三个月<sup>[22]279</sup>。赵三多起义时,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尚在高潮,这时,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已与义和团运动在时间上重合。

列强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高压的、挑衅性的从中国取得领土让步的行动以及法国积极谋求铁路特权;外国辛迪加和各类特权受让者的经营所引起的不安;反教情绪;此外,还有光绪皇帝的改革,这是田贝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或背景的分析<sup>[1]174-176</sup>。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檄文也这样揭示起义背景:“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愈张,其势愈暴,……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本义民……爰起义兵,誓雪国耻。”<sup>⑫</sup>可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有着相同的背景。事实上,两者在时间上的关联也不可能使其有不一致的背景,对此,台湾学者吕实强也注意到了<sup>[21]138</sup>。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都属于费正清所谓教案中有组织的群众暴动。义和团“挑铁道,把线砍”<sup>[22]33</sup>,“近畿及山东等省,义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sup>⑬</sup>,“共计被杀害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友18000人;更正教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相应地庚子赔款高达450000000两。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止两日龙水镇成为兵山一座”<sup>[23]511</sup>,不到10天募6000余人,最多时上万人<sup>[18]73-75</sup>,波及全省30余州县<sup>[21]122</sup>及周边各省。教会与教民财产损失逾4000000美元,20000人无家可归<sup>[24]355</sup>,赔款1186100两<sup>[25]891</sup>,乃义和团运动前赔款最多的教案。当然,因为是整体比较,两者在行为的激烈程度与规模上还是有一定距离。

几与太平天国农民相反,义和团“扶清灭洋”,“他们的目的是恢复清朝的主权和焕发清朝的生机,……使中国摆脱外国人及其宗教”<sup>[11]250</sup>。他们不仅把这几个字写在旗帜上,也用于文告开头,这既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也“以扶清灭洋为宗旨”<sup>⑭</sup>,表示“如果皇上授权,余栋臣准备扫清敌人,建立一个比尧舜时代更美

⑩相传明李梦阳任考官时,考生张梦阳未注意避讳,李梦阳不高兴,遂出联讥之:“简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张梦阳对曰:“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

⑪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和明治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版,第156页。转引自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文本前言第5页。

⑫郭鸿厚《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余栋臣传》,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辑,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86页。

⑬此即一般所谓清政府对外宣战诏书中的话,转引自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⑭《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余栋臣传》,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辑,第486-487页。柳琅声等《民国重修南川县志·历代》云,余栋臣“建顺清灭洋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辑,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611页。

好的天下”<sup>⑤</sup>。陈振江、程献认为,正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首先把反洋教运动反对洋人“欺主谋国”的认识概况为“顺清灭洋”口号,义和团的宗旨与其具有同样的性质<sup>[22]275-281</sup>。至于义和团“扫清灭洋”,已非义和团运动主方向。余栋臣于“顺清”之时也谴责“朝廷百官昏不解事”,“拟先杀川省教民,次取外省城邑,次立新皇于燕京”<sup>[23]520-521</sup>,清廷认为“逆情昭著”<sup>[25]775</sup>,所以,也“具有反清灭洋的症候”<sup>[26]225</sup>。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剿抚不定,朝令夕改,清政府的态度颇为关键。赵三多起义,清廷一方面要直隶总督裕禄调兵遣将,另一方面又要裕禄与山东巡抚张汝梅督饬地方官派员劝谕解散。朱红灯起义,刚斥责“署平原县蒋楷,办事谬妄”,又埋怨山东巡抚毓贤偏袒义和团,著“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sup>[27]7-8</sup>。1900年4月下旬,义和团进京,5月29日“着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6月3日又警告大学士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sup>[27]14-15</sup>。而对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清政府也是亦剿亦抚,左右为难。开始的近20个上谕一般都要求护理四川总督文光、总督奎俊、布政使王之春以及川东道任锡汾“即剿即抚”<sup>[25]775</sup>,1899年1月3日始命奎俊、王之春“务期殄厥渠魁”<sup>[25]805</sup>,而20日又著派员前往“宣布朝廷德意”<sup>[25]813</sup>,并在余栋臣投降后下令“赦之,以昭大信”<sup>[25]821</sup>,甚至“厚其给养,嘉乃志”<sup>⑥</sup>。可以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在应对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时已得到试行。

此外,长期以来,西方将“义和”译为“正义与和谐”,“显然民间使用这一名称时,‘义’是关键”<sup>[11]150</sup>。而“被最多数人民称为英雄义士”<sup>[23]629</sup>的余栋臣正是以“义民”自居。

总之,在“义和团变乱前夕”,还没有哪一个“反教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如此相同或相近,以致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人奏四川余蛮子材勇可用,其人尚在监禁”,清廷以600里谕令“著奎俊察看覆奏”<sup>[25]907</sup>,湖南巡抚俞廉三以及后来的四川总督锡良都把“余蛮子”与“拳匪”相提并论。至于没有义和团的组织

与仪式,只是表明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斗争水平更高,负面成分更少,以之为起点,正可以改善义和团运动的形象。

#### 四、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

在1986年5月天津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上,张力就呼吁把京津义和团斗争前后两年内一些地方“扶清灭洋”或“反清灭洋”的斗争,凡具备反帝性质、与政府武装对抗、成员主要是普通劳动者、由会党组织、有简单口号以及迷信、盲目排外诸条件者都纳入义和团运动范畴,因为没有山东人民发难,就没有京津义和团的搏斗,没有全国人民声援,特别是南方各省反洋教斗争,就不成其为义和团运动<sup>[28]422-423</sup>。如此说来,不仅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且周边各省受其影响的反教斗争无疑都属于义和团运动的范畴,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不仅仅是“四川省的一个反教运动”,实直接推动半个河山义和团运动。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无疑也拉开四川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四川义和团运动到处都能发现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的影子。1982年,张力在其《四川义和团运动》一书中就详细论述了四川义和团运动,当然,他所论述的四川义和团运动是从“响应北方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九〇〇年)”开始的<sup>[29]48</sup>。1907年底,梧生《排外与仇教》一文痛陈比年“吾蜀民教构难之陈迹”,首先就谈到“辛丑,余栋臣首祸于大足,蔓延及铜梁永川,掳教士,毁教堂,几酿巨变”<sup>[30]</sup>。不过,他把时间弄错了,应该是“戊戌”,而非“辛丑”。余栋臣投降后被禁锢成都<sup>⑦</sup>,义子余绍泉、余绍文仍在铜梁、江北一带坚持活动。当年7月,部将张桂山复出扰教。“北信谣传”时,“余蛮子党羽尚多,已时有聚众劫牢之谣”<sup>[23]636</sup>。在此背景下,1900年7月初,大邑县罗文榜建“顺清灭洋”旗,“乡愚不知而附和之”,一时间,成、邛、眉、雅各属有“明目张胆与官抗拒之匪”,“温、郫、崇、灌间有匪夜间抢教堂”<sup>[23]649-650</sup>,川东梁山县也发生屏锦铺教案,有教民被杀。于是,“首府以为此匪非开导团保实力严防不为功用,撰说帖一纸”,即《开导士民说》<sup>⑧</sup>,其中就谈

<sup>⑤</sup>Correspondence from Chungking, The North China Herald, Oct. 3, 1898. 该报还报道,在余栋臣看来,“他的国家正处于被来自大洋彼岸的‘犬羊之国’所吞并的危险,在此危难时刻,他要帮助自己的祖国。” Correspondence from Chungking, The North China Herald, Oct. 10, 1898.

<sup>⑥</sup>汪海如《啸海成都笔记》,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编委会等《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二十六册,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722页。

<sup>⑦</sup>余栋臣于1899年1月投降后被禁锢成都,民元初始释归。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世纪出版集团2006版)第三卷第180-181页所谓1月20日,华芳济被救出,余栋臣投降,被加以管束,“五月间余蛮子又揭竿造反,并纠合了心怀不满的人在他身边。他又被‘镇服’了;七月间在大竹又发生了另一次叛乱,在那里很多的教徒被杀害了。余蛮子又被加管束,在八月间被逮捕,他的同乡人发动了叛乱,作为对这件事的抗议”,逻辑混乱,有违史实。

<sup>⑧</sup>张力认为为奎俊所撰。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然从重庆知府鄂芳转布《开导士民说》函内“首府以为此匪非开导团保实力严防不为功用,撰说帖一纸”一语看,应为成都知府刘心源。

到虽然四川“乃坏一余蛮之发愤”，而“至今蜀人犹啧啧乐道，匪徒遂踵而行之”<sup>[23]649-652</sup>。同年秋，余栋臣部属刘玉龙由湖北返回，欲在云阳县起事<sup>[29]52</sup>。1901年3月初，泸定县人祝华山“纠匪忽劫司铎而去，将踵大足余蛮子故辙，肆其要挟”<sup>[31]372</sup>。1902年4月下旬，资阳义和团起义，四川义和团运动高潮来临。7月底或8月初，张桂山“密函勾通资阳拳匪，约定八月秋后举事”<sup>[23]735</sup>。8月27日，《汇报》报道：“川匪披猖，习拳者多，尚有余蛮子死党死灰复燃，将蔓及全省。”<sup>⑩</sup>年底，内江、富顺、威远和资中谣传“余蛮子的队伍”打回来了<sup>[29]109</sup>。1904年初，富顺兰俊章打教，锡良批：“余蛮子、拳匪、红灯教等案前鉴具此”<sup>⑪</sup>。很显然，四川官员以“余蛮一案”为反面教材“开导士民”的愿望落空。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坚持10个月，波及37州县和一个土司，余栋臣本人“被大多数人民称为英雄烈士”，其影响自然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据夏明宇考证，讴歌余栋臣的民谣《大足有个余栋臣》和《余栋臣做事顶大梁》就创作于民国初年余栋臣以“保清”被杀之后<sup>[32]</sup>。

“鄂省藉余蛮子之势，宜施各属匪徒四起”。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后，虽然文光请湖广总督张之洞一体飭属防范，张之洞也下令宜昌镇台暂勿赴日，妥为防范，“鄂省藉余蛮子之势，宜施各属匪徒四起，假其名号焚掠教堂教民，掳杀教士，宜昌大为惶扰。”具体而言，1898年11月29日，长乐县毁教堂，杀教民。长乐教堂为巴东比利时教士兼管，长乐教民奔巴东，被追往，并掳洋教士，旋杀害。12月12日，利川县教堂、育婴堂被毁，并焚掠教民多家。巴东、长阳和长乐“匪徒”还“欲西趋川境，与余蛮合伙”，“阳乐之匪”甚至闯入长乐县城，掳县令、典史。建始县教堂亦有警情。余栋臣投降后，老河口仍有人伪造其揭帖，掷入教堂，进行恐吓。所以，开始时张之洞还给四川官员献策，抚谕余栋臣，后来便力主进剿，并提议由总理衙门与法国公使达成谅解，以免投鼠忌器<sup>⑫</sup>。1900年7月19日，枣阳100多人又“大张顺清灭洋旗帜”<sup>[33]400</sup>。同年秋，刘玉龙由湖北返回四川，欲在云阳县起事，云阳、开县和万县派兵追捕，他

又去汉口，与富有票党人联合开展斗争<sup>[29]52</sup>。

贵州成为余栋臣部属发动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舞台。1899年10月3日，仁怀县“陈玉川等效川匪余栋臣故智，以仇教为名，惑众倡乱，胆敢攻扑县城，抢署劫狱，以致遵义所属无知愚民被其煽惑，群思蠢动，几至燎原”。此次上千人的起义，历时两个月，陷仁怀后尚扬言进攻省垣。此次起义不仅“效余栋臣故智”，其实，就是陈玉川与余栋臣的部属张立堂、廖子香共同发动的<sup>⑬</sup>。张桂山复出扰教，“经兵团击溃后，窜匿他省”，此处“他省”即贵州。1902年7月底或8月初，他就是“由贵州密函勾通资阳拳匪，约定八月秋后举事”，四川洋务局札飭严密防范<sup>[23]735</sup>。另据新修《大足县志》记载，与张桂山在一起的还有余栋臣最重要的同谋蒋赞臣的儿子蒋尚卿<sup>[34]759</sup>。

湖南贺金声的“行径，直与拳匪及四川余蛮子、直隶之景廷宾无异”。1899年1月14日，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俞廉三：“澧州北南坪石水田地方教堂教民被匪毁抢罄尽”，现仍在“假托余蛮伪官衔”出示滋扰，教士教民无处安身，速实力弹压，勿致滋蔓<sup>⑭</sup>。其实，余栋臣军中就“多湖南产者”，并一再表示，不远千里，原为行大事，以坚定余栋臣的信心<sup>[23]520-526</sup>。1902年9月，湖南营务处提调贺金声高举“大汉灭洋军”旗帜在邵阳起义，众至200000人，要求各国“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甚至劝余廉三与起义军合作，建功立业。余廉三认为，“核其行径，直与拳匪及四川余蛮子、直隶之景廷宾无异”，诱捕处死<sup>[35]190-191</sup>。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有人把余栋臣与湖南反教旗手周汉并称“二义”，要朝廷重用<sup>[19]238</sup>，现在，余廉三又把贺金声与余栋臣相提并论，自非巧合。

云南“彭大川张顺清灭洋旗帜”。四川《民国续修筠连县志》云，1898年12月17日，“滇匪彭大川率土匪三百人来仇教，捣毁天主教堂。后政府赔银三万两”。又道，“戊戌冬，彭大川张顺清灭洋帜，声称仇教，将来犯，始成立团防局”，放炮迎彭大川入，彭大川毁教堂，捕教民而去，“赔银九万两”，县令去职<sup>⑮</sup>。这里出现两个赔款数字，即使以“三万两说”推断，彭大川行动给筠连县带来的冲击实在不小。

⑩《汇报》第406号，1902年8月27日。

⑪《四川官报》甲辰十月中旬第二十七册公牍，“光绪三十年川督锡良批富顺兰俊章打教事”。

⑫以上“鄂省藉余蛮子之势，宜施各属匪徒四起”情况，皆出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七辑《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牍)》三十六、三十七，文海出版社。

⑬《贵州通志》(仁怀厅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义和团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2-1083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79页称，此次“武装暴动，县长被杀”，考诸《贵州通志》(仁怀厅志)应该不是事实。“廖子香”胡齐畏《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第138页作“廖学香”，大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大足文史资料选辑》(二)，内部发行，时间不详。

⑭《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牍)》三十六。

⑮祝世德《民国续修筠连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6辑，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601页、第576页。

而正是为了制止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向周边各省蔓延,1899年1月3日,在下令奎俊、王之春“务期歼厥渠魁”当天,清廷尚下诏云:“川省余蛮子闹教日久,心怀叵测,势难安抚。已谕令奎俊等相机剿办矣。惟毗连各省,均有教堂,无业游民难保不为煽惑,乘机起衅。况湖北施宜两属,已有焚抢情事,不可不及早防维”,著张之洞以及云贵总督崧蕃、贵州巡抚王毓藻和广西巡抚黄槐森“各即严飭地方文武,镇静民心,力护教堂。一有谣传,迅即弹压拊定,毋任闻风附和,纷纷效尤”<sup>[25]806</sup>。

赵三多起义,义和团运动——确切地说,华北义和团运动渐渐兴起,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西南乃至中南一些地方义和团运动渐渐兴起,而赵三多起义除了有义和拳称号和在山东爆发,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相比。张力当年就批评“北方说”、“四个月说”和“奉旨说”,对其他省配合京津义和团的斗争或默然不提,或有意避开,或归之为一般的反洋教斗争,甚至否定这些省人民对京津义和团的支援,“不能设想一场惊天动地的义和团运动,只在京津一带突然爆发,而邻边各省人民却在隔岸观火”<sup>[28]422</sup>。

### 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

前面已经谈到,赵三多起义之受到重视,无疑是因为此乃“义和拳作为反洋教活跃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及其主要口号‘扶清灭洋’出现的开始”。其中,“扶清灭洋”口号的出现,就使“义和团获得了一个决定今后历史的方向”<sup>[11]250</sup>。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发生直接关系,充分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固有逻辑”。

陈振江、程献指出,山东民间武术团体一般都与民间宗教有这样那样的历史渊源,“反清复明”色彩浓厚,不可能一下子脱离传统影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迫切需要符合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冠县、威县地处直鲁通道,梨园屯人民屡屡开展反洋教斗争,这里的义和拳较之神秘色彩浓厚的大刀会和神拳更能敏锐地感受新的行动纲领。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周边地区纷纷响应,引起很大震动,官方文书、新闻工具和社会舆论将起义消息及其口号传至北方,对山东正在兴起的反侵略斗争无疑是一种新的启迪。在此背景下,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三个月后,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打出了“助清灭洋”的旗帜<sup>[22]279</sup>。

《重修信阳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五年秋,蜀人

李某、罗某以拳术来游,寄寓南城上之奎星楼,游手少年趋之,结为兄弟。李自称大刀会遣出巡方者。因而散放票布,传习符咒,云能御风雷,避枪炮。会中以‘助清灭洋’为宗旨。举事之日,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惟持会票者得免。由是爱国守旧及挟排外迷信种种误解者争趋焉。而畏祸难,惜身家,欲得其票布为护符者尤众。每票取钱三百文,秘密中辗转售出,何啻万数。”<sup>⑤</sup>张力即据以推断,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提出“顺清灭洋”口号,这一口号当即通过一条秘密渠道传向邻省,由四川罗某、李某传入河南,再由河南传入山东与直隶,不久,山东大刀会和义和拳等拳会组织便放弃“反清复明”主张,接受“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主张<sup>[29](前页)</sup>。日本学者铁山博对张力的观点给予一定支持<sup>[26]232</sup>。当然,张力所分析的路线图还值得商榷,因为光绪二十五年秋是1899年秋,此时,赵三多起义已过去差不多一年,约与朱红灯起义同时,尽管“扶清灭洋”口号正“是在平原获得了主导地位”<sup>[11]250</sup>。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使“义和团获得了一个决定今后历史的方向”,在陈振江、程献看来不是偶然的,此次起义所在川东地区一直是民教冲突的“一大焦点”,著名的酉阳教案(1865年)、江北教案(1876年)、重庆教案(1886年)、大足教案(1890年)都发生在这里<sup>[22]276</sup>。我赞成他们的看法,并要补充几起此前在川东发生的重大教案,即1863年第一次重庆教案、1868年第二次酉阳教案以及1873年黔江教案。其中,第二次酉阳教案平民死亡1620人,教民死亡476人,而义和团运动前民教冲突总共死亡3563人<sup>[36]63-64</sup>,其严重性可见一斑。1898年江北教案也是一起重要教案,有教民死亡,“各国领事竞起为难”<sup>[25]740-741</sup>,实为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导火线。就大足而言,1886、1888年也都发生过教案,1888年那一次,余栋臣已成为主角。1890年大足教案,即余栋臣第一次起义,其檄文历数“酉阳打于前,贵州杀于后,白果巷夺其巢穴,重庆府毁其房廊。江北创先陈子春,马跑受害雷健侯”<sup>[37]123-124</sup>,亦可证川东乃至贵州民教冲突环境对此次起义的影响。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为义和团运动吹响思想的号角,至少表明义和团运动的思想源头在川东。

总之,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然而,长期以来却被混同为一个问题。“义和团,起山东”,是当时人,甚至在

⑤陈善同等《重修信阳县志·灾变》,《义和团史料》下,第1047页。

义和团运动当中<sup>②⑥</sup>,由于“身在庐山”,对义和团运动的全貌与本质尚缺乏足够认识,仅凭一些表面现象所得出的草率结论,诂一直沿用至今——不管后来如何重塑“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这个结论大体未变<sup>②⑦</sup>。这就使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义和团运动始终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形象,始终是一个“被神话化的过去”。我论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即试图把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区分开来,以充分显示义和团运动的全貌、本质以及晚清教案的严重性。

#### 参考文献:

- [1] CHARLES DENBY. China and Her People; vol. II [M]. Boston: L. C. Page & Company, 1906.
- [2]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上卷[M].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3]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M]. 张理京,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 [4] 毛泽东. “友谊”, 还是侵略[M]//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5] 林华国. 历史的真相[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 [6] JOHN K. Fairbank. Patterns Behind the Tientsin Massacre [J]. HJAS, 1957: 20.
- [7] SMISH AH. China in Convulsion; vol. I [M]. New York: Press of Riggs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Albany, 1901.
- [8]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9] 贺弘景. 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反洋教斗争初探[M]//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10]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一卷[M]. 张汇文, 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6.
- [11] 周锡瑞.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 张俊义, 王栋,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丁魁良. 花甲记忆[M]. 张俊义, 沈弘,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3] 阿绮波德·立德.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M]. 王成东, 刘皓, 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8.
- [14] 吴盛德, 陈增辉. 教案史料编目[Z]. 北京: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1941.
- [15] 廖一中, 李运华. 论近代教案[M]//吴金钟, 译.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 合肥: 黄山书社, 1993.
- [16] 杨天宏. 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7] 赫德. 义和团, 1900[C]//这些从泰国来——中国问题论集. 叶凤美, 译.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 [18] 李时岳. 反洋教运动[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 [19] 中国史学会. 义和团: 第一册[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0] 戴玄之. 盛宣怀与东南互保[C]//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 庚子拳乱.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1] 吕实强. 义和团变乱前夕四川省的一个反教运动[C]//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一期.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9.
- [22] 陈振江, 程献.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 [23] 四川省档案馆.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Z].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 [24] LATOURETTE K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 第2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26] 铁山博. 评“大足教案”和“顺清灭洋”口号[C]//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 译. 南开史学. 1983(1).
- [27] 中国史学会. 义和团: 第四册[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8] 张力. 再论四川义和团运动[M]//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29] 张力. 四川义和团运动[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 [30] 梧生. 排外与仇教[J]. 四川, 1907, (1).

<sup>②⑥</sup>如1900年4月17日裕禄致总署电称,“义和拳、大刀会始于山东,自上年秋冬渐延及于直隶”(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页)。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考证“义和拳匪始发难于山东沂州之十八团”,并云“是考作于光绪辛丑”(中国史学会《义和团》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3页)。赫德于使馆被围期间撰《北京使馆——一次全国性的暴动和国际事件》一文,其中写道:“到了1900年春天,义和团已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越过山东地界,蔓延到了北直隶”(赫德《这些从泰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明恩溥也认为义和团来自山东(Arthur H. Smish. China in Cconvulsion, vol. I, Press of Riggs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Albany, New York, 1901, pp196-197)。

<sup>②⑦</sup>这里“大体未变”,意指路遥已把“义和团,起山东”修正为“义和拳运动乃发生于直、东交界地区”(路遥《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林华国认为“直隶省和山东省一样,都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林华国《历史的真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 [31] 锡良. 锡良遗稿: 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2] 夏明宇. 广为传唱 经久不衰[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2009(6): 19-25.
- [33] 李林. 拳祸记: 下卷[M]. 上海: 土山湾印书馆, 1923.
- [34] 大足县县志编修委员会. 大足县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6.
- [35]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 第一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2.
- [36] 陈银昆. 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 [37]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近代史资料[Z].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1).

## The Second Uprising Led by Yu Dongche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Boxer Rebellion

LI Chong-hua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P. R.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Boxer and the origin of the Boxer Rebellion, in spite of being linked to some extent, are two issues. "The Boxer was from Shandong". However, the Boxer Rebellion was initiated from the eastern areas of Sichuan. It is the Second Uprising led by Yu Dongchen rather than the uprising led by Zhao Sanduo or the one led by Zhu Hongdeng that started the Boxer Rebellion. Because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missionary cases and the forms of organization and rite are just some of th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also because the Second Uprising led by Yu dong Chen is the same as or similar with the Boxer Rebellion in some important aspects, the Second Uprising led by Yu dong Chen promoted the Boxer Rebellion in nearly half of the country and was intrinsically linked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Boxer Rebell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tatements of the origin of the Boxer Rebellion, such as "Shandong version" or "the North version", will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Boxer Rebellion more completely.

**Key words:** Yu Dongchen; the Second Uprising; the Boxer Rebellion

(责任编辑 彭建国)